

第二章 中國與大一統思想的相關概念

中國與整個中華文化之脈動息息相關，因此論及「大一統」，不可能互有排斥，再者，現今兩岸關係雖已躍進高科技的 21 世紀，卻仍僵持在「一個中國」的界定，顯見兩岸有其無法類同於越南模式、德國統一、兩韓現象，甚或歐洲聯盟等整合模式的界面。¹在此時空座標互異的峙立下，²兩岸雙方更無法徒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地化（Regionalization）與中國化的相互頡頏，³模糊中國一統的本質，畢竟沒有任何統合能夠不以歷史觀與國際觀的統合為其基礎。⁴準此，本章試圖從中國史及文化面切入，將繫乎全文的關鍵概念包括「家天下」、「國家」、「中國」、「大一統」，先予廓清，更逐步探討大一統思想的特質，以及大一統在醞釀過程中所表現的政治文化現象，最重要的還在於它對中國的影響。

第一節 中國「大一統」思想的政治文化背景

一、家天下的體系與儒家思想

中國是一個有特別歷史和文化的民族，它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⁵更相信中國即世界，即文明。中國人既然以世界及文明自居，則建立在種族之上的民族主義觀念自古以來也顯然不發達。相對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在家族，⁶「家族取向」(family oriented) 或許是傳統中國社會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特徵，

¹ 詳見許仟、何湘英，「文化中國的大一統觀念」，政策研究學報，(第 2 期，2002 年 5 月)，頁 2。

² 詳見米歇·傅科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絕，(台北：麥田出版，1993 年)，頁 5。

³ 許仟、何湘英，前引文，頁 29。

⁴ 南方朔，「『國統綱領』進入十週年之建言」，中國時報，(第 2 版，2001 年 2 月 19 日)。

⁵ 程兆熊，世運之來中國文化及歷史大勢，(台北：大林出版社，1979 年)，頁 28。

⁶ 王振輝，中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台北：韋伯文化，1999 年)，頁 21，全寅元，「清季『自強思想』與韓國『開化思想』比較研究」，(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1987 年)，頁 14。

⁷久之遂自然發展成中國特殊且至高無上的「家族 - 政治文化」。

家庭 (The Family) 和家族 (The Clan) 在中國社會上有其極特殊的地位。⁸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即早期部落群居生活方式所使然；其二即儒家思想的中心指導。太古時代，地廣人稀，食物的獲得，並不怎樣困難，等到人眾繁衍，生口增多，人類為維持共同的生存需要，乃相聚為部落，形成以血統為組織中心的氏族社會。⁹嗣後氏族因生產力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勞動生產群體得以縮小，¹⁰開始以家族或家庭為基本單位來組織生產和生活。¹¹在此基層社會中，大部分人因生活保守，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個人問題，而非常倚重家族生活，¹²從此確立了家族本位制。但這畢竟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如何能漸進自成一套有體系的組織架構，發揮其如同西方組織的影響與約束力，並有效操控著家庭所有成員的行為，甚而轉成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其關鍵即在儒家的思想體系。

儒家是中國人倫文化的集大成者，¹³其學說以「倫理」為本位、以「仁愛」為基本原則，它要求人民一切行止要合乎於禮，由家為起點，再推及於宗族戚黨，更向外推廣於非家庭關係如師徒、東夥以及君臣官民等關係。¹⁴由此它界定一系列上下從屬關係並樹立上位者不可侵犯的權威，如學生要聽從師長、子女要聽從父母、晚輩要遵從前輩，下屬要聽從上司，而全國子民都要聽從皇帝，皇帝更需履行正確的敬神祭天儀式，才能確保國家的昌盛。家族成員在此敬天畏神的組織網絡化育下，咸以為「忠於君」則生活環境必安泰與昌明，因此益加認真執行「合禮」的教化工作，由是家族的地位益形鞏固，¹⁵而中國皇權的鞏固亦如是。德國史學家黑格爾 (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認為中國將家長制視

⁷ 汪文濤，中國家族觀念對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台北：正中書局，1986年)，頁 28。

⁸ Liu, Hui-Chen Wa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s, Local Village, 1959。引自黃國昌，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 17

⁹ 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18。

¹⁰ 張琢，中國文明與魯迅的批評，(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 11。

¹¹ 沈大德、吳廷嘉，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探析，(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年)，頁 29。

¹²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頁 77。

¹³ 沈大德、吳廷嘉，前揭書，頁 167。

¹⁴ 梁漱溟，前揭書，頁 79。

¹⁵ Kenneth Lieberthal 著，楊淑娟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1998年)，頁 4。

為原則，並發展為國家生活的有組織的制度，¹⁶形成所謂的家長政治。¹⁷誠然，儒家講仁與黑格爾的「家長政治」論有相同的基本觀念，俱是將君臣及整個社會關係「一概家庭化之」，¹⁸亦即，君要愛民如子，民應視君為大家長，並將對父母所盡的孝道移轉為對皇帝的盡忠。同樣地，其他如師徒關係則互稱師父與徒子徒孫，官民關係稱為父母官與子民，鄉鄰朋友更互稱伯叔兄弟、姨婆姊妹等。整個中國社會在非權力關係¹⁹下緊密聯結，形成一個擁有血緣與愛的關係²⁰之政治組織，從此人與人的關係，有了簡而易行的準繩。

更重要的是，在此組織內的人民均需對家族負責，其一切作為亦應取得家族支持，因而，平時所呈現的非勇往直前、衝鋒陷陣、冒險犯難，而是瞻前顧後、處處保守，要非整個大環境已到了家不成家、族不成族、國不成國的境界，不會輕言起義，更別說醞釀推翻暴政的集體概念與行動。正此之故，中國上層政治人物無論是漢民族，抑異族主政，對儒家思想多極為推崇，主要就是基於其所強調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五倫的微妙關係，及其一再強化的「忠君」思想。是以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習採君主制與家長制。換言之，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家族政治同一存在，且與君主政權彼此依存。

當然，中國史上也絕不乏推翻暴政的實例，逢此又當如何解釋儒家的忠君思想呢？其實這就涉及本文主軸之「大一統觀」，將另述於第二節。在這裡，若單從家國觀念來看，人民由於生活保守且受儒家思想影響，平常習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然運作，所以每遇王朝初亂，少聞民變。換言之，人民一因安於現狀，再因「天高皇帝遠」，更因國家之亂猶未殃及家族，致而無關痛癢，也就無動於衷。然當戰事蔓延，家園累遭破壞，社會蕩然無序時，人民漸生警覺，旋即發起沛然莫禦的抵抗力。這種由個人到家庭、家族、氏族、

¹⁶ 夏瑞春（德）編，陳愛政等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11。

¹⁷ 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82。

¹⁸ 梁漱溟，前揭書，頁80。

¹⁹ 周陽山、傅偉勳編，西方思想家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60。

²⁰ 同上註。

宗族、再到國家的循環往復，久之遂孕育成「天下一家」的政治文化背景。

既是天下一家，則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也於焉產生。中國自第一個朝代夏朝開始，就確定了以家天下為社會原則的世襲制。²¹從此以降，西周、秦漢乃至中國最後一個王朝 - 清，皆秉此家天下的寶塔式政治制度。²²在此制度下，無論王位或皇位的繼替是同姓相繼 - 世襲型或異姓相代 - 交替型，帝王的個人意志往往就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志。²³偏偏人治下難以抗拒人性私慾和權力的傲慢，君王總是本能地將王朝的私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此時如果廟堂之上有賢者建言，當其言論影響統治者政權時，輕者賢明君主尚能有條件的加以改造利用，重者即棄而不用。就這樣，中國漸成為封閉保守的政體，國家的政經發展受到有形的拘束，每每未至王朝末年，即臨分崩離析。是時家天下的群體意識再起，又成為捍衛國家政權的主流民意，如此反復，又形成治亂循環的現象。

考證歷史，中國曾飽受重大衝擊，但卻未摧毀其賴以維繫的文化之本，舉如西晉以後約三百年的南北分裂，中國文化未因胡人統治而遭到滅絕，反開啟隋唐文化盛世，又如印度佛教雖一度鼎盛於唐代，亦終融入中國文化，成為中國式的佛教，13 世紀蒙古人入主中國，到中、末期，也被漢文化所融化，滿清以外來的少數民族成立清帝國，初以懷柔和高壓政策統治中原本土的多數民族，最終仍然抵不過漢文化的同化，其後列強以軍事和經濟侵略中國，皆使中國文化遭受空前的劇烈破壞，而此等破壞依舊未能打斷中國文化經脈。追溯其因乃中國並非建立在種族，也不是地域，而是文化。中國文化在家庭倫理方面迥然不同西洋文化的發展，它使「國的防線」之內層多加一道「家的防線」。²⁴

針對於此，中國歷史的侵略者如蘇俄或許有較深的認知，他們了解欲滅中國人的國，必先拔掉中國的根，亦即消滅中國人的家。但這又何嘗不是一刀兩刃的作為，蓋中國人以家為中心的觀念既根深柢固，一旦家園毀壞，則必將採取犧牲

²¹ 蔡君謨，中華帝國爭霸史-中國皇帝大觀 上，台北：華嚴出版社，1995年，頁115。

²² 范炯主編，歷史的迴旋 - 古中國的悲劇：人物卷，(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頁63。

²³ 同上註，頁60。

²⁴ 黎東方，我對歷史的看法，(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7年)，頁36。

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行動，這麼一來中國的根還是拔不掉。所以，歷史上中國的外患祇能偶爾打破中國人的國，卻無法打破這鞏固的家族觀念，其因就在「家的防線」深刻觸及整個中國的建構歷程。因此，王者或起義者每借力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力量」，以正其名，並藉之獲取人民的擁護，誠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種「向上發展與向下延伸」以及「上下層交流互動」的雙軌政治現象，輕易地在中國複製「換天不換帝」的專制帝國制度。

中國的歷史顯示，儒家思想，是歷代皇帝甚至異族主政後得到民心最有效的武器。²⁵然操縱者往往惑於權利或汲於政治運作，未能身體力行主導以倫理、仁愛思想為原始架構的政治環境，遂又在家家的捍衛下，慘遭吞噬。不過，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與儒家思想的交相影響，誠然也使中國在歷經諸多變亂下，仍能凝聚一股強大力量，遂使中國未因分裂而解體，更形成獨特且難以撼動的政治文化。

二、家國天下轉軌的文化大國

中國自古無所謂「民族國家」觀念，才會只見家天下的文化綿延於各朝諸代，猶未有一整體性的集合名詞出現。是故在歷史的推進中，惟有將中國之家天下與西方國家之定義相結合，才能說明中國之貫古通今，為此宜先探西方國家之源起。

國家係源自西歐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²⁶，此「民族國家」雖係民族與國家之組合，其實卻少有一民族一國家的存在，故民族與國家形式上雖已獲得統一，但實質上二者仍然各具領域，即民族是一個種族與文化的概念，國家則主要是一個政治與法律的概念。²⁷前者為感性、屬非目的與選擇之凝聚；後者則為理性的結合，有其目的與利益的糾葛。

關於國家(State)一詞的解釋，各家說法或各辭典百科全書不盡一致，僅就權力、組織、地域等相關定義略加舉例闡釋。中世紀時，義大利人馬基維里

²⁵ 許烺光，中國人與美國人，(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年)，頁457。

²⁶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東吳歷史學報，(第1期，1995年)，頁72。

²⁷ 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18。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首先以「Stato」指稱政治團體，此處國家被視為一「權利主體」：

所有支配或曾支配人類的國家和統治權，或是共和國，或是君主國²⁸

布萊爾利 (J. L. Brierly) 則以組織關係和制度的建立說明國家的功能：

國家應是一個組織，亦即是說，它是人們在人際間建立的一種關係制度，作為達成特定目標的工具，這制度最基本的是在他們的活動範圍內有一套秩序在運行著。²⁹

國家如果只是一個權力機構，一個組織，一種制度，但這又何異於一般社會組織？

對此，Kent V. Flannery 有其更清晰地補充說明：

國家是一種非常強大，通常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具有一個職業化的統治階級，大致上與較簡化的各社會特徵的親屬紐帶分離開來。它是高度的分層，與在內部極端分化的，其居住型態常常基於職業分工而非血源或姻緣關係。國家企圖維持武力的獨占，並以真正的法律為特徵。…… 國民個人必須放棄用武，但國家則可以打仗，還可以抽兵、徵稅、索貢品。³⁰

另外，美國地理學者哈特遜 (Richard Hartshorne) 亦曾以「共同生活地域」、「共同生存價值」闡釋國家：

國家是由一群人民聚居於一固定的地區，同時也共同保存著一種特殊的生存價值。為確保與發揚其生存價值，因而，互相要求居於此一地區的居民，必須有一組織，作為政治上的領導機構，藉以達到此一目標。這個組織即邦 (State)。³¹

歸納綜合上述註解，國家應可界定為：

國家是由一個有權力的政府，它具備政治組織，擁有獨占武力、一群人民、

²⁸ N.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 by L. Ricci; N.Y. :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1955), p.37. 引自馬起華，三民主義政治學，(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7年)，頁200。

²⁹ J. L. Brierly, The Law of Nations, 5th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18. 引自馬起華，前揭書，頁206。

³⁰ 何茲全，「中國的早期文明和國家的起源」，中國史研究季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2期，1995年)，頁9。

³¹ 蕭樾編著，世界政治地理學基礎，(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33。

固定的居住地區、一定的生活型態、生存價值等多元因素形構而成。

相較於西方世界十六世紀以來對「國家」有偏屬於權利或工具的觀念，中國早期國家概念自有所不同，它是文化的、道德的。³²中國之「國家」一詞最早出現在先秦的經典中，一因它的型態源自春秋、戰國時的貴族之家；其次，此家是由君主與擬制的家臣所組成；³³再者，春秋之前，既有人類、土地，與上下階層關係，則必然也有其類似國家的組織運作，當時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呈現類似的國家型態？亦必有所探討，否則無以為繼。

早於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之五帝時期，因生活的低度需求、資源的有限、工具的缺乏、技術的原始，未能創造更多的資源，彼此爭奪不已，幾個氏族乃商議組成部落社會，設定規則以為部落所共遵，藉此防止外族攫取生活空間內的資源。此後人口漸增，社會的需求較往昔大，部落或酋邦的功能漸失，資源爭奪隨之而起，部落之間訴諸爭戰、不斷聯盟，終而形成「萬邦」³⁴。邦國的出現促使王和王權的形成，產生王臣子民之分，進而有了臣服納貢的關係，改變了社會結構，並造就一個更強大的領導機構，此時的王權可謂已掌控戰爭指揮權、祭祀權和行政管理權，機構也有劃分行政區域、設置治事官吏，創制曆算、文字、宮室、田畝、服制、舟車、貨幣、醫藥、弓矢、陣法，實已具備「原始國家」的規模。³⁵其間之運作，基本上已符合馬基維里所述之以權力為主體的國家定義。

帝舜崩，治水有功的禹即天子位，禹死後傳位子啟，從此中國由「禪讓政治」轉成「父子繼承」王位的世襲制，由夏到商，王位則進入「兄終弟及」，若少弟死則以長兄之子相承的「直系傳承」制，³⁶西周時期，更進一步分封同姓並以「嫡長子」繼承，成為宗統與君統合一的周王國。由是觀之，商人繼夏人之後承接中

³²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25。

³³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前引文，頁71。

³⁴ 史記·夏本紀云：「徙眾居民，乃定萬國。」，所謂萬國，是指各氏族集團裏的許多部落。引自李鑒等編譯，中國文化概論，（台北：三民書局印行，1991年12版），頁71。

³⁵ 王式智，中國歷代興亡述評，（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頁13。

³⁶ 國語·晉語篇，頁120：「商人饗國31王。」總計王位遞嬗30次，其中兄終弟及14，父死子繼16。

原霸權，擴大其領域，並充實其組織，周人復繼商另開封建制度為其政府組織，它以王族建構其核心王國，再褒封先盛王朝黃帝、堯、舜、禹等後代之異姓諸侯，以安撫天下，並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封，成就以公族為核心的二級國家政權組織，而諸侯之下尚有大夫之家，係以家組織為核心建構的基層政權和隱性國家。³⁷在「王國 - 侯國 - 大夫」等的級層下，斯時周代國家已具有方國聯盟的性質，³⁸可謂具有趨近今日國家政府組織的雛形。

有了類似國家政府組織的周邦是否就等同國家？則需再審視其內部權力的運作而定。周邦在名義上是統治天下，實際上卻為統治王邦。在分權制下，諸侯的土地與人民係由周天子冊封，另一方面在宗族組織的基礎下，他們對周天子而言為小宗，對內則自為大宗，擁有該部分土地與居民的統治權與宗主地位，亦即在政治、經濟及內政上享有其獨立的自主權，不受王朝的制約，但對王邦而言，他們仍需擔負助戰、納貢、朝覲等一定的義務。依此衡之，周朝在文治武功均盛時期，對諸侯各邦擁有相當整合的政治文化和相當充實的政治權力，幾等同周聯邦國，故西周時期已確定由酋邦轉為早期國家，³⁹具備了國家出現的條件。⁴⁰此處稱早期國家，乃因西周雖已具備國家之雛形，但它所採行的封建制，其基本精神為地方分權，所呈現的是政治權力層級分化。⁴¹理論上其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層層分化，以致無窮。⁴²是而西周時代只可謂處在從結構到職能等國家條件還未臻成熟和完備的階段，仍需隨社群組織的擴大逐步向更高權力匯集，才符合西方「國家」的定義。

這個具備早期國家型態的西周進入春秋快速轉動的軌道中後，其原先呈現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不復存在，⁴³而諸侯國則在實力益增下，主權更為集中，主權分化現象漸不存在，遂形成諸侯分裂割據的新局。此其間，國與邦

³⁷ 張榮明，殷周政治與宗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頁151。

³⁸ 同上註，頁153。

³⁹ 何茲全，前引文，頁10。

⁴⁰ 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修訂版），頁31。

⁴¹ 同上註，頁141。

⁴² 雷海宗、林同濟，文化型態史觀，（台北：業強出版社，1988年），頁13。

⁴³ 史蘇苑，「國·天下·國號」，文史知識，（北京：中華書局，第5期，1985年），頁54。

國間之互動與時俱增俱見於古籍中，如：

詩經：王于出征，以匡王國。⁴⁴

老子：莫之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⁴⁵

大學：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⁴⁶

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⁴⁷

管子：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⁴⁸

由「國家」一詞在春秋典籍的頻頻出現，顯見當時國家概念已漸臻成熟。其後大國起而兼併小國，萬國因而減少到春秋初期的一百八十幾個國家，此時國家的意義在名實各方俱見增強。

戰國末期，呈現七國分立的局面。國的數目日益減少，相對的國的面積卻日益擴增，各國的政治結構或官僚制度都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此時期「國家」一詞尤較前普及。再者，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他們往往汲汲營營造國家之利多，其中最常被引用的莫過於梁惠王與孟子的對談：

梁惠王：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

孟子：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⁴⁹

斯時之諸侯國稱得上是「真正國家」，它較之西方國家的發軔要早，也來得成熟。

再從中國文字學來看，單就「國」之字型本身就已揭示相當明顯的國家組成要素，即「國」需以城牆圈住固定的領域，並用「干戈」保護圈內之人民，此土地、人民、國防三者，與孟子之「諸侯之寶三，人民、土地、政事。」⁵⁰相呼應，而孟子所言更與西方所謂之國家四資格「固定的人民、確定的領土、政府、及與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⁵¹相共鳴。大體言之，戰國時代，諸國實已具備相當完整

⁴⁴ 詩經·小雅卷 17 六月篇，頁 581，

⁴⁵ 老子·治國章，頁 180。

⁴⁶ 大學·傳 10 章，頁 25。

⁴⁷ 中庸·第 24 章，頁 69。

⁴⁸ 管子·形勢第 2，頁 307。

⁴⁹ 孟子·梁惠王上，頁 381。

⁵⁰ 孟子·盡心下，頁 716。

⁵¹ D.P. O'Connell,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65), vol. 1, pp.304-305。引自馬

的國家觀念。

直到秦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帝國後，中國始啟動國家的一體運作。然秦帝國初立，傾向專制獨裁，背離民意，群雄紛起，整個中國再陷入諸侯國聯盟的混亂，經楚漢相爭後，終由劉邦建立漢朝。漢初的局面，依據通鑑記事本末的記載為：

高帝初定天下，昆帝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⁵²

正由於高帝奮身隴畝定天下後，乃大封功臣為王侯，同時也封同姓宗室為王以作屏藩，未幾遂衍生同姓諸侯國與中央政府爭權的矛盾，輾轉到了漢武帝時，諸侯國的力量才大受削弱，由此始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制，並迂迴前進持續到清帝國滅亡為止。⁵³

綜上所述，從西方國家角度觀之，中國在西周時期已有「早期國家」的型態，春秋戰國時國家觀念又較具體，可謂「真正國家」，秦漢而後更成為一中央集權的大國。縱使如此，清朝之前中國都從來不曾有民族國家的觀念，⁵⁴境內普遍存有的依舊是超越國家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⁵⁵之天下觀。

從中國天下觀的角度來看，天下與國乃屬兩個涵義不同的概念，⁵⁶或可謂位階不同，此多見於古籍中，諸如：

人有恆言：「天下國家」。天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⁵⁷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民易世，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⁵⁸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喪其天下焉。⁵⁹

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⁶⁰

起華，前揭書，頁 206。

⁵²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台北：三民書局，1972年），頁 117。

⁵³ 鄭欽仁等著，魏晉南北朝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頁 5。

⁵⁴ 王鵬令，民族主義與國家前途，（台北：時英出版社，1997年），頁 75

⁵⁵ 詩經·小雅·北山篇，頁 733。

⁵⁶ 史蘇苑，前引文，頁 54。

⁵⁷ 孟子·離婁上，頁 536

⁵⁸ 管子·霸言第 23，頁 612。

⁵⁹ 莊子·逍遙遊第 1，頁 31。

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⁶¹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仇也。⁶²

換言之，中國所言之天下乃氏族、邦國或封建制下諸侯國之最大集合體，天之下有諸國，國之下有眾家，正所謂：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⁶³

此處之星可為諸國，或眾家，或萬民，凡此共同形成上下階層之一體論。這裡說一體，乃強調中國的文化統合，凡認同華夏文化者，即為中國，則中國無遠弗界，其最高統治者稱為「天子」，必須知「天命」，而其所負責的領域即「天下」，⁶⁴遂有天下觀。

然而，初時中國與天下之間，其範疇不一，如：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⁶⁵

顯然，中國與蠻貊有其不同地域與文化之界分，卻共存又共融於天下，何如？先是中國把宇宙設想為以中國為中心的無數同心圓，認為距中心愈遠者，便愈野蠻，⁶⁶因而，自稱「天朝王國」或「君臨天下」，相對之四周各族及西方世界自然成為「蠻夷」和「化外」，皆是圍繞中國旋轉和朝貢的。⁶⁷其後中國藉著朝貢的政治要求，使夷狄入中國，而予歸化之，此即「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這種對異族採取的同化政策，即是中國以文化成就其世界主義色彩的國家觀念。衡此，這家、國、國家、文化、中國、天下等概念基本上皆在中國的文化融合下形成一體，疆界範圍因之逐步擴大，此即所謂「家國天下」同構的文化國家論。

⁶⁰ 墨子·法儀，頁 17。

⁶¹ 韓非子·五蠹第 49，頁 1366。

⁶² 王守謙等譯注，戰國策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394，「蘇秦為趙合縱說楚威王」。

⁶³ 論語·為政篇，頁 100。

⁶⁴ Gary G. Hamilton 著、張維安、陳介玄、翟本瑞譯，中國社會與經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頁 122。

⁶⁵ 中庸·第 31 章，頁 80，另引文之中有「墜」字其義如「墜」。

⁶⁶ 艾蒂安、白樂日著、黃沫譯，中國的文明與官僚主義，(台北：久大文化股份公司，1992 年)，頁 35。

⁶⁷ 王鵬令，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台北：時英出版社，1997 年) 頁 75。

依此論證，中國為一象徵性的天下，天下諸國互有界線，卻因天下無界，境內人員、物資互動頻繁，兼併之作為亦時而出現，故不特強調具體之疆界及人口，更有別於現今的主權國體，其關鍵全繫於中國文化上，此所謂「春秋之義，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同生地球上，本無所謂國。」⁶⁸針對於此，清初樸學大師顧炎武（1613-1682）在其「日知錄」中另提出更鞭避入裏的國與天下之辨：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⁶⁹

顧氏所言乃將「國」與「天下」以「國體之硬體建造」與「文化之軟體建構」作區隔。揆諸歷史，西周首都鎬京、秦之咸陽、西漢長安、東漢洛陽毀滅了，而有朝代更迭，謂之亡國，然亡國後，整個大中國的文化是延續而擴大的，故而有南朝的奠都金陵、北朝的新洛陽、隋唐兩朝的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北宋汴京、南宋臨安、遼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等。是以，亡國，係王朝廷皇室⁷⁰、係亡政權，亡天下係亡原則；⁷¹亡國，則中國依舊在，亡天下，則文化無存，即中國人不成中國人，盡變成夷狄，⁷²才是真正之國滅。由是更得以確認，中國早存有萬國之國家稱呼，其後更以朝代之名為狹義之國號，惟凌駕其上尚有屬文化層面之天下，故有天下觀而無甚國家論。在此文化結構中，家國皆是生滅循環的有形體，天下則是無形恆在的抽象體，倘天下諸國都能有所治理，諸國人民自可安居樂業，自當符應中國「天下國家可均也」⁷³的社會期許。

綜此，可為「家國天下轉軌文化大國」定出一套理則，即中國自古以文化傳承，有家天下的政治文化，間而涵蓋西方所言之國土擴大、人口擴增、主權存在等國家概念，遂孕育出「文化大國」的深層結構。這個大國，莫之其極，形同天下，而天下為一，無庸另定名號，也不受諸國爭戰或朝代更迭的影響，皆常存。

⁶⁸ 譚嗣同，仁學卷下，譚瀏陽全集，頁 55-56。引自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 - 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35。

⁶⁹ 趙儷生，日知錄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92 年），頁 120。

⁷⁰ 梁漱溟，前揭書，頁 166。

⁷¹ 趙儷生，日知錄導讀。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92 年，頁 120。

⁷²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0 年修訂 8 版），頁 161。

⁷³ 中庸。第 9 章，頁 44。

三、由文化天朝蛻變為實質中國

前小節提到中國文化大國之轉化，但這個大國一直以來毫無西方世界國家定名的概念，有的只是放諸四海皆準且符合其文化傳承的天下觀，故稱之為文化天朝。緊接著出現另一個問題，即此天朝是在什麼情況下開始轉化為以「中國」為國名之國家？常謂，中國自清而後始因西方的衝擊，而面臨「近代國家」(modern state)，亦即西方所言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挑戰，但這又與「中國」何關？然道中國自古即代表整個中國，其本質意涵究為何？其間的連結如何形成？是外力或文化久經成習，抑二者雙軌同步所致？諸此均應深入探討。

中國的概念在中國天下觀的整體架構中始終是模糊、不確切的。依據王爾敏所著「中國名稱溯源」，「中國」兩字於秦前五十三種文獻中有二十五文獻共出現一百七十五次之多。⁷⁴秦漢而後，各朝代之古籍史料中更一再出現「中國」。可以說歷朝各代雖有鼎革，而「中國」卻一貫存於中國之天下。然此「中國」與朝代之間的關係究為何？欲知於此，則不妨先探中國之原義。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尚書」。當周公進諫周成王時首度提及「中國」：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⁷⁵

除此，先秦時期不乏有關「中國」的敘述，此可由陳穗錚⁷⁶依據王爾敏「先秦典籍所見『中國』詞稱彙錄」補正與整理後所列之「先秦典籍所見『中國』一覽表」窺其一斑。不過，本文另求清晰呈現「中國」之多元意涵，乃據之簡化相關中國之原文摘引，另典籍中多見雷同之引述，尤其春秋三傳重複之處甚多，均酌參其義，一一刪除，此外再增列涵義欄，以利對比參考，詳見表 2-1。

⁷⁴ 引自趙振績，「中國之釋義」，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台北：中國歷史學會，第 10 期，1978 年)，頁 29。

⁷⁵ 尚書·周書·梓材篇，頁 321。

⁷⁶ 陳穗錚，先秦時期「中國」觀念的形成與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表 2-1：先秦典籍相關「中國」之引述一覽表

書名	篇名	原文	摘要	引涵義
尚書	梓材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		諸夏
詩經	大雅民勞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國中
	大雅蕩	女炁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		國中
		咨女殷商，……內于中國，覃及鬼方。		國中
大雅桑柔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國中	
春秋左傳	莊公三一年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諸夏
	僖公二五年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諸夏
	成公七年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諸夏
	昭公九年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諸夏
春秋公羊傳	莊公十八年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諸夏
	僖公二年	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諸夏
	僖公四年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狄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諸夏
	僖公九年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		諸夏
	宣公十五年	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		諸夏
	襄公七年	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		諸夏
	昭公元年	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		諸夏
	昭公二五年	有鸛鷓來巢，何以書？……非中國之禽也。		諸夏
	哀公十三年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諸夏
	僖公二七年	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諸夏
	僖公二八年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衛國
	僖公二八年	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曹國
	文公十一年	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		諸夏
	宣公十五年	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		諸夏
	成公九年	莒雖夷狄，猶中國也。		諸夏
春秋穀梁傳	成公十二年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諸夏
	襄公二年	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國中
	襄公十年	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並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諸夏
	襄公三十年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		諸夏
	昭公元年	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諸夏
	昭公十一年	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		諸夏
	昭公二五年	來者，來中國也。		諸夏
	昭公三十年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國中
	定公四年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		諸夏
	哀公四年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諸夏
	哀公十三年	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諸夏

春秋穀梁傳	哀公十四年	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諸夏
國語	齊語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諸夏
	楚語上	蠻夷戎狄，其不賓已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	諸夏
	吳語	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	京師
管子	小匡	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	諸夏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	諸夏
	霸言	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諸夏
	小稱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皆待此而為治亂。	京師
	侈靡	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	國中
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		諸夏	
墨子	親士	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	諸夏
	節葬下	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	諸夏
	節葬下	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然則葬埋之有節矣。	諸夏
	非命上	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諸夏
	魯問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	諸夏
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諸夏	
莊子	秋水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諸夏
	田子方	魯人有請見之者，……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魯國
	知北遊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諸夏
	天下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諸夏
孟子	梁惠王上	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	諸夏
	公孫丑下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國中
	滕文公上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諸夏
		禹疏九河，……，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諸夏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諸夏
	滕文公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	諸夏
	離婁	舜……周文王……得志行乎中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諸夏
	萬章上	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京師
告子下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諸夏	
荀子	王制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諸夏
	王霸	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諸夏
韓非子	存韓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	諸夏
	十過	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	諸夏
	孤憤	越雖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	諸夏
	用人	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無思越人以救中國之溺者。	諸夏
	難	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	諸夏
	難勢	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	諸夏

楚辭	惜誓	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飄乎尚羊。	國中
穆天子傳	卷二	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	諸夏
周禮	秋官司寇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初圖土者殺。	國中
禮記	檀弓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諸夏
	中庸第三一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諸夏
	王制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諸夏
	樂記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諸夏
	大學傳十章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諸夏
爾雅	釋地	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諸夏
戰國策	秦策二	中國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	專指山東各諸侯國
	秦策三	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于中國。	諸夏
		今韓、魏，中國之處，……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	諸夏
	齊策三	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	諸夏
	楚策三	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	諸夏
	趙策二	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	諸夏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	諸夏
		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	諸夏
		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	諸夏
	趙策四	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	諸夏
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		諸夏	
燕策二	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	諸夏	
呂氏春秋	仲秋紀簡選	吳闔廬……，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諸夏
	有始覽聽言	夫流於海者，……及其期年，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	諸夏
	離俗覽高義	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諸夏
黃帝四經	經法	上下無根，國將大損；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	中等國家
孫臏兵法	見威王	堯有天下之時，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	諸夏
		亡有戶（扈）是（氏）中國。	諸夏
列子	湯問	北國之人鞮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	諸夏
		周穆王西巡狩，……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京師
吳子	料敵	三晉者，中國也。	諸夏
尸子	卷上	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	諸夏
	卷下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獾。	諸夏
	卷下	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諸夏
鶡冠子	王鈇	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	諸夏

資料來源：1.陳穗錚，先秦時期「中國」觀念的形成與研究，（台北：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頁9-28；

2.加網底線及粗斜體字者為有別於諸夏之不同涵義；3.自行重新整理製表。

從上表摘示之引文看來，中國之涵義可大致歸納為五，即京師、國境之內、諸夏領域、中等之國及中央之國，⁷⁷但總其義，又幾以中原諸侯國為其核心。再仔細推敲其演繹，中國初應僅為區域之區隔，當時天下沒有固定疆界，卻因中國自古講究中庸之道，強調中心位置，這中心即王畿所在地，亦即周之所在地，故有中邦、中國之謂。除此，顯然周也有以中國與諸夏並同，用以收取民心之意，如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處之諸夏即中國之意。再者，在春秋時代的文獻中，中國更進為區隔四夷之統稱，也隱約而見文化之強力區分。此如「大學」即以「中國」作為一個相對於四夷之中央所在地區：

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⁷⁸

再如「左傳」亦有相同之記載：

周王賜給晉侯陽樊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⁷⁹

及至戰國時代，中國出現的頻率益增，顯見列國相爭，凡欲爭霸者，皆必須捨邊緣化而近核心之中國，方能成就其霸業。孟子在騰文公上篇更詳加解釋中國之所以別於四夷，非一夕而得，乃上承堯、舜、禹等的累積開發與一貫治理，才得以發展出中國之農耕成果，並進而教化人民，終能優於四方之夷狄：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禹疏九河，滸、濟、漯，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得而食也。...，教以人倫...，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⁷⁷ 陳穗錚，前引文，頁 7-8。

⁷⁸ 大學：傳 10 章：釋治國平天下，頁 25。

⁷⁹ 左傳：僖公 25 年，頁 434。

北學於中國。⁸⁰

似乎此時，「中國」由地域而政治又為文化的觀念已渾然一體成形，且此地域、文化、政治並無固定之疆界，故有所謂之「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中國乃順此歷史的發展而逐步擴大。總括以論，先秦時期中國原無特定意義，初只用於區隔我族與他族的地域稱呼，漸漸地因政治核心地域之區隔，又轉為文化之差異，終而定位為文化的總體象徵，所以馮友蘭乃認為，中國在古代「文化」意義最甚。⁸¹由此，中國與文化遂得以結合。

秦一統天下後到西漢立，中國呈現出大一統局面，此時中國與大一統帝國漸趨為一，中國似成為一統帝國的象徵名詞，如：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⁸²

正此之故，其後中國出現的頻率與敘述顯得既多且較自然。此類文獻典籍繁多，無復列表呈現，惟為確立中國的長此以往，乃按朝代序各列舉一二說明如下：

先就成書於漢朝的戰國策來看，其中有關范雎對秦昭王提供攻齊的戰略，就曾道出「誰能深悟中國文化之奧秘，誰就能洞視時代趨勢。」它逕引「誰主控中國之地，誰就掌握先勝利器，也就能掌握天下。」的先見之明。此處之中國顯然已為「中原文化」之代稱：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⁸³

再看漢武帝時，除中國外，天下尚有未與之同俗的大宛、大夏、安息等夷狄之邦，故此際諸夏夷狄明確有別，惟其時，中國之領域範圍已別於先秦，如：

⁸⁰ 孟子·滕文公上，頁 496-497。

⁸¹ 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台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頁 10。

⁸² 史記卷 97·酈生陸賈列傳第 37，頁 2697-2698。

⁸³ 張清常、王延棟注，戰國策箋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 132。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⁸⁴

東漢而後，中國之稱謂更為穩定，尤其面對匈奴時，嘗習以中國自稱：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警盛德，威武二垂，陵虐中國。⁸⁵

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呈分裂之勢，然中國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位居正朔者，往往以中國自稱並藉之睥睨他族：

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刺史），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⁸⁶

孝伯（北魏尚書）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宋文帝安北將軍府長史）曰：「握髮吐哺，本施中國耳。」⁸⁷

隋結束南北大分裂之局面後，也同樣每於論及胡人時，才相應提及中國，是以中國儼然成為王朝一切朝政、人文、地理、山、川、河流的統稱：

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穎謂太府卿何稠曰：

「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⁸⁸

唐朝繼起，一面既依秦漢路線，一面則別開中國胡漢混一之宏觀，有文謂：

李唐一族之所以決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驅，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復，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⁸⁹

所謂「新機重啟，擴大恢復」，乃指楊隋與李唐皆為胡漢混一之血統，卻都毫無例外的承繼中國文化。不過，斯時中國仍為中原文化之意，並用之別於突厥外患：

倫曰：「突厥憑陵，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眾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⁹⁰

⁸⁴ 漢書·張騫傳，頁 119。

⁸⁵ 後漢書·杜詩傳，頁 156。

⁸⁶ 晉書·王衍傳，頁 39。

⁸⁷ 宋書·張暢傳，頁 139-140。

⁸⁸ 隋書·高穎傳，頁 87。

⁸⁹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論稿」，收編於陳寅恪先生全集，（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頁 153。

⁹⁰ 舊唐書卷 68·封倫傳，頁 658。

而貞觀時代(627-649)，中國之範圍較前更為擴大，唐太宗更逕將中國與四夷融合為一：

又謂侍臣曰：「中國百性，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⁹¹

唐後歷五代分裂，此其間中國似已從抽象性的文化體轉為實體有形的區域集合體：

太宗見(張)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集左右近習。」⁹²

另見遼國和西夏的使臣，亦直呼宋宰相司馬光為中國相，易言之，朝代只是一個政權的代表，而中國顯然已為對立另一方稱正朔一方的代稱：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⁹³

元朝入主中國後，原則上仍視中國為「文化禮儀」之中原地區，故君臨中國，要遵中國禮儀，重祭祀，興祖廟，以達四海一家：

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⁹⁴

緣此，中國區域再次擴大，廣含唐朝之中國區域與四方諸國，若併以彼時海運不甚發達之況及疆域概念觀之，可謂至極，幾可等同天下。

明代在成祖時，中國之稱呼似隨鄭和下西洋另有突破，漸進而為對比印度、泰國、蘇門答臘、馬來西牙、阿拉伯半島、非洲諸國的總稱。換言之，過去以中國別於境內異族之說法，因族群不斷融合及面臨接踵而來的海洋勢力，已漸失憑藉，讓中國的涵義有了新的詮釋：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

⁹¹ 貞觀政要·安邊第36篇，頁274。

⁹² 門歸主編，26史精粹今譯，(台北：建宏出版社，1994年)，頁1747。

⁹³ 宋史·司馬光傳，頁162。

⁹⁴ 楊家駱主編，元史，(台北：鼎文書局，1986年)，頁3769。引自至元元年，徐世隆向元世祖上奏之內文。

月命和及其僑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⁹⁵

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⁹⁶

此時天朝王國除以中國相對於四方夷族外，更遠及西方世界。就政體來看，中國自始就未嘗狹隘地與「政權」或「國家」單一掛勾。是故秦統一前，中國既非指夏、商、周的任何一朝代，也不是指春秋戰國的任何一國，如齊、晉、鄭、宋、魯、衛之類；秦統一後，更沒有確切資料顯示中國專指任何一朝，如秦、漢、隨、唐、元、明、清等各朝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廣泛深奧的代名詞，它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展，⁹⁷自上古到春秋戰國，再到秦、漢、隋、唐、元、明各朝，其間歷經魏晉南北朝及五代十國之長期分裂，穿插華夏、漢族與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匈奴、羯、羌、氏、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各種族的區隔與混一，所以說中國在其疆域內，即中國所謂的四海天下之內，擁有一超越種族、超越國家、凌駕西方國家的象徵意義。

明朝之前的文獻，非全然成書於當代，也非專集中於某幾代，是故其所呈現中國非國體而為文化屬性，及屢見於史實，在在說明中國文化的一致與連續性。然自成祖開啟西方門戶以降，西方諸國交通中國也日繁，於明代中葉，先後佔距中國較近之據點，提出互市之要求，如葡據澳門、西據菲律賓及荷據台灣。約在此時，俄國亦屢犯邊界，而卒使中國產生另一個轉折意涵，竟成為非中國產物之「國體」名稱。

國體意義的中國，肇端於清初之中俄邊界問題。當其時，俄國對於中國早有覬覦，遂趁清朝入主中國之初，國內未靖之際，入侵黑龍江邊境，佔雅克薩城。

⁹⁸1681年清先平定三藩之亂，復於1684年趁勝追擊將台灣歸入版籍，完成一統，

⁹⁵ 明史·鄭和傳，頁227-229。

⁹⁶ 明史·佛郎機傳，頁306。

⁹⁷ 陳致平，什麼是中國人，(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再版)，頁3。

⁹⁸ 胡秋原，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台北：學術出版社，1970年)，頁24。

清廷在無後顧之下，遂於 1685 年中俄邊境衝突之際，大敗俄軍，雙方議和，於 1689 年 9 月 7 日締結「中俄尼布楚條約」⁹⁹。此為中國與外國所訂之第一個條約，約中俄國即以中國稱呼清廷，謂：

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于康熙 28 年 7 月 24 日，兩國使臣會于尼布楚城附近，為約束兩國獵者越境縱獵、互殺、劫奪、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兩國邊界，以期永久和平。¹⁰⁰

當時該條約是以拉丁文、滿文及俄文三本呈現，但循此譯文猶知俄國乃以中國為清之代稱。是時西方世界早有國家觀念，對於中國封建王朝循環更替、周而復始，及任何朝代均不足以代表中國的現象，當有認知，其平時縱可稱呼中國為清帝國，簽約涉及時效性的承認，需國對國才有法權的代表性，故對俄而言，當然要慎擇雙方皆可接受的國體概念記載於文件上。過去因秦征服百越，百越與西方貿易接觸頻繁，秦的大名，早已不脛而走，如阿剌伯人於中世紀稱中國為秦 (Sin、Thin)，波斯 (今伊朗) 稱中國為支那 (China)，¹⁰¹迨後中國 (China) 之名即如是輾轉遠渡重洋；而對清而言，中國在歷史的進程中似已轉動成為境內四海一家的共識共知。正因雙方的交集，中國始正式成為此約「清廷國體」的總稱。

不過，要待真正漢、英文本條約的出現才更能證實此一看法，這又與英國的銳意東進有關。當一波波海權國前仆後繼的東進下，英國也不甘示弱趁 1684 年清廷重開海禁之際，順利取得與清正式貿易的權利。到了十八世紀末，一者因海權擴張與工業發展，二者更因英國至乾隆年間已成為中國對外最大貿易夥伴，¹⁰²

⁹⁹ 尼布楚條約簽定時，中國代表在一份滿文，一份拉丁文的約本上簽字蓋章；俄國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約本上簽字蓋章，所以僅拉丁文的約本是雙方簽字蓋章。針對此條約，中國所注重的是劃界；俄國所注重的是通商。雙方均達到了目的，從此黑龍江，吉林，及遼寧三省及現今俄屬阿穆爾省及濱海省亦均為中國的領土，此約共實行了 160 餘年。引自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上）從順治到咸豐」，清華學報，（北平：清華大學，第 8 卷第 1 期，1932 年 12 月），頁 28。

¹⁰⁰ 詳見褚德新、梁德主篇，中外約章匯要 1689-1949，（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0。劉民聲、孟憲章、布平編，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頁 505-507。

¹⁰¹ 趙振績，「中國之釋義」，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台北：中國歷史學會，第 10 期，1978 年），頁 29。

¹⁰² 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頁 65。

此時英國對清的要求日益升高，亟盼提升官方層級的貿易往來。其後清英雙方各有堅持，導致衝突升高，引發鴉片戰爭，英軍兵臨南京城下，迫使清廷於 1842 年 8 月 29 日與英簽訂較諸前中俄諸條約更苛刻的「南京條約」，又稱「萬年條約」或「江寧條約」¹⁰³。此條約與尼布楚條約相隔 153 年，條約內容已有漢文本出現，並直呼清為中國帝國，約中第十款的英文本也清楚的載明：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a fair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¹⁰⁴

也正是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急速從「天朝帝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¹⁰⁵而其後，遂有魏源(1794-1857)提出：「以夷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¹⁰⁶的主張。換言之中國自明朝而後原含「夷夏之分」與「中西之別」，由是乃正式由「中西之別」完全取代，而此中西相遇正顯示出中國傳統地位的變化。¹⁰⁷同治年間，清廷漸以「中國」作為整個國家之總稱：

上海係通商之地，外國應協助中國防守。¹⁰⁸

及至光緒初期，中國出現頻率更高，朝臣上下論國際情勢或勘界時俱自稱中國：

李鴻章奏尊議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八條。¹⁰⁹未經中國允准葡人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¹¹⁰藏為中國屬地，乃竟不知恭順朝廷。¹¹¹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焉。¹¹²

¹⁰³ 胡光廙，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8。

¹⁰⁴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 - 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頁512。

¹⁰⁵ 田文軍，馮友蘭與新理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頁61。

¹⁰⁶ 陳華、常紹溫、黃慶雲、張廷茂、陳文源點校注釋，魏源撰「海國圖志」(上)，(湖南：岳麓書社，1998年)，頁1。

¹⁰⁷ 胡秋原，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台北：學術出版社，1970年)，頁25。

¹⁰⁸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第1輯·卷18，頁438，同治元年壬戌二月丁巳條。

¹⁰⁹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3輯·卷151，頁1383，光緒八年壬午九月甲申朔條。

¹¹⁰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4輯·卷247，頁2281，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辛巳條。

¹¹¹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4輯·卷249，頁2298，光緒十三年丁亥十一月壬戌條。

¹¹² 清史·德宗本紀二，頁351-352。

綜上得知中國這個國體稱呼，自 1842 年起即轉為「條約世紀」¹¹³下多難及受壓迫的反射，這個反射再結合文化的縱層理想與想像，遂漸而由文化天朝轉成文化中國。

本文摘要及第一章均曾界定全文之時代斷限乃至清末台灣建省，但為求中國國體轉軌之完整，乃另摘要後記如下：

當中國轉入國體意義之初始，清朝對內的正式名稱還是大清帝國、大清或清，如此內外不一致的情形，直至清帝國於 1912 年被推翻後，中國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才正式融入十九世紀中葉西洋的「近代國家」、「民主憲政」，而最終以「中華民國」定名，簡稱中國，從此中國正式成了國家的代名詞。¹¹⁴所謂的「中華民國」即是兼顧了種族、民族層面的「中華」以及政治法律層面的「民國」。¹¹⁵就西方國體觀念審視，中國可遠溯 1689 年起中俄尼布楚條約簽定時，才進入國體世界，1912 年清帝國被取代後始正式稱中國，這在表象上未嘗不正確，實質上正因斷層的出現才更有所憑藉以求溯源。蓋從上述中國文化史的角度探析，中國自始未嘗間斷，故明清之際，西方勢力入侵，在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下，中國始能在共識共認之下轉為國體之對外稱呼，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更正式將文化 - 民族 - 國體兼容並蓄，以一貫之，政治中國由是依倚此文化大國，合稱文化中國，或簡稱中國。此乃蔚為中國之超國家定義，亦是「中國始如其為中國」¹¹⁶的不變定律。

¹¹³ 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 222。

¹¹⁴ 葛劍雄，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台北：萬象圖書股份公司，1993年)，頁 26。

¹¹⁵ 陳儀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收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比較，1994年)，頁 39。

¹¹⁶ 陳其南、周英雄主編，文化中國：理念與實踐，(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4年)，頁 54。

第二節 文化中國與大一統思想的接軌並進

誠如前節所言，中國家天下的政治文化係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後復因西方政治體的入侵，乃漸次由文化天國轉為文化中國，終以中國總稱。但儒家思想何居此地位？其背後之依據為何？這可從中國本質的具體轉變中，理出屬於思維面向的連結網絡，它如同巨大的吸盤，不斷磁吸著多元的政治實體，而每成一統之局。此謂「一統」，自無以棄「大一統」思維而不論，故周桂鈿乃言，係大一統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¹¹⁷究其言，又必然與前述之文化中國的形塑過程有所接軌或形成重疊，遂更呈現「大一統」與中國文史的不可分割性。

一、大一統思想的醞釀

（一）西周時期

夏朝的諸侯國君商湯因夏桀無道，起而滅夏，建立商朝，商朝末年，紂王暴虐，再由夏、商的諸侯國周滅之，建立周朝，從武王滅殷至幽王（1027-771BC）被滅約二百五十七年，¹¹⁸其間共歷十二位王，¹¹⁹稱之為周朝，另稱西周，以別於東周。前節曾述及，在周朝，中國即已有早期國家的雛形，也有中國之泛稱，但彼時主政者或社會上下階層是否即因而存有「大一統」的共同認識？這個問題可從尚書之周書篇的敘述得到相關呼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民于承湯，刑殄有夏。』」

¹¹⁷ 周桂鈿，「大一統思維方式的由來發展與作用」，中國文化月刊，（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第127期，1990年），頁79。

¹¹⁸ 朱鳳瀚、張榮明編，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5 & 432。

¹¹⁹ 此十二王，分別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¹²⁰

由於上古時代敬天畏神，諸侯國未敢專憑個人意志行事，縱欲推翻昏庸政權，也總要秉承天意以為迂迴，好求師出有名，進而獲取民心。是以周要代夏、商，即出現此對比性的敘述，一則強調前朝君主之荒淫昏聩，不顧民生疾苦，為天所棄，另則言明周王為天之子，是天命的人間化身，其行之以德、取法于天，故能繼殷、夏一統四方諸國。而文中一再重複之「四國多方」，也顯示西周時期早有社會所認同之天下整體的雛型，並有一最高統治者共為治理。此時之一統天下，雖僅指諸夏之地，然周朝為救平商族的傷痛並達族群之和諧，¹²¹而行分封，初創「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¹²²的局面，及其透過宗法制度，把天下和宗族緊閉結合在一起，使族權與政權合一，¹²³諸此作為皆可謂出自於一統之思維概念。

此外，虞夏書之禹貢篇另云：

九州攸同，四隅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¹²⁴

這九州乃指雍州、冀州、衞州、徐州、荊州、揚州、梁州、青州，豫州等九個區域。顯然，斯時中國已有宏規之統籌，其諸州、山脈、樹林、河川、湖澤被推論也有粗略之規劃，且諸此區域據考據又與西周疆域大致相符，因之，在西周一統之下的民人方能不分地域自由居住。

上述二論，旨在推證西周時代，四方諸國遵周天子為共主，中原地區既為一統，則相當程度的區域規劃有其可能。是故，「周書」與「虞夏書」俱已輪廓式地佐證周初早已有了統一的思想與統一的事實。¹²⁵

¹²⁰ 尚書·周書，多方篇 頁 387-392。

¹²¹ 葉達雄，「周族的坐大與族群的和諧」，歷史月刊，(第 98 期，1996 年 3 月)，頁 68。

¹²² 荀子·儒效篇，頁 119。

¹²³ 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316。

¹²⁴ 尚書·虞夏書·禹貢篇，頁 92。

¹²⁵ 辛樹幟，禹貢新解，(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 年)，頁 42-43。

再如詩經·小雅篇有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¹²⁶

此話其實是周朝一位士子針對斯時社會勞逸不均現象所表達的憤懣。但一般研究「大一統」思想的專書論文，習於擷取前兩句，用以說明西周社會中普遍存有「天下之大，大如四海，唯有一人為最高統治者」¹²⁷的觀念。從社會語言學來看，若非時人有如斯反應，亦當不致有此運用，是以「天下為一」的概念早存於西周亦由此可知矣！

綜上得知，西周時期社會對於天下的認知，已能由現代政治學的角度，即「土地」和「人民」的角度思考，是具體的由空間言「天下一統」。¹²⁸惟其所施行的是裂土分封制，境內諸侯享有自己的領地，儼然一個個獨立王國，所以實際上西周仍為「一而不統」、「有中央無集權」的局面。¹²⁹

（二）東周時期

自西元前 771 年周幽王被殺，翌年周平王在西戎的威逼下，把都城遷都到維（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¹³⁰此時期周室的王畿範圍已大不如西周時期，軍事武力更不足以服眾，王權逐漸衰弱，不再具有西周時期對諸夏的統治地位，其權威甚至僅及宗教禮儀上，倚賴搖搖易墜的宗法制度維持其「天下宗主」的虛名。王權的衰微，打破以往各諸侯間的均勢，使同一華夏民族分裂為各諸侯國家。¹³¹由是進入春秋諸國彼此攻伐，並競相擴充實力的時代。

在春秋時代的激烈競爭中，大國爭霸，形成春秋時期最顯著的時代特徵。¹³²小國也亟力圖取生存之道，四方夷狄更趁機入侵中原，可謂整個社會轉趨蠕動。

¹²⁶ 詩經·小雅·北山，頁 733。

¹²⁷ 劉志琴、吳廷嘉，中國文化史概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70。

¹²⁸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頁 165。

¹²⁹ 劉志琴、吳廷嘉，前揭書，頁 70-71。

¹³⁰ 顧俊，中國文明史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2。

¹³¹ 楊學琛，中國民族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3。

¹³² 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中），（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529。

初諸侯國自居周的王國，以「尊周室，攘夷狄」為口號，即中原華夏諸國在周天子名義下結合，對內以維持諸夏之秩序，對外以共抗夷狄之內侵。然而，諸夏實際上乃趁周室衰微，增加國力，如輔佐齊桓公的管仲（725-645BC）為推行富國強兵之策，就特別提出「一體之治」的理論，¹³³宣揚「以開萬物，以總一統」¹³⁴的統一政治。這種強調國家一統才能富強，亦才得兼併鄰國、累積人口及財富，即形成當時之政治趨勢。結果小國一一被兼併，列國遞減，至春秋末年已剩下幾個大國和十餘個中等國家。大國則土地擴增，不斷擴權，逐步朝區域霸權發展。此外，在兼併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亦漸化異為同，逐步建構同一的政治環境。

當時大國為了厚植國力，紛紛大力延攬人才，遂使士階層隨之水漲船高，而士的興起，又刺激各種思潮的蓬勃，影響社會至深，其中尤以儒家為其正宗與主流。當時儒家對於春秋的變動極為不滿，孔子（551-479BC）據魯史而修春秋，即呼籲「王正月」，論語也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¹³⁵又云：「甚矣吾衰也！久矣無不復夢見周公！」¹³⁶凡此無非闡揚周禮因襲夏、商二代的一貫性，而亂世之際，遵周道即行天命。換言之，孔子以為一個大環境絕對需要一套合理制度，維繫政治秩序，方可止亂，故力主諸國重建封建的秩序，¹³⁷踐行周王室封建制的的天下一統。大體而言，此時期「封建分權的一統觀」被社會殷盼為弭平政治亂源的利器。

其後墨子（489-403BC）也建議將國君的政治權力，架構在「一同天下之義」，¹³⁸然其理想中的天子，已非專尊周王室，而是擇賢良以為天子：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¹³⁹

¹³³ 周立升主編，春秋哲學，（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03。

¹³⁴ 管子卷14．五行第41，頁740。

¹³⁵ 論語．八佾篇，頁119。

¹³⁶ 論語．述而篇，頁171。

¹³⁷ 甘懷真，中國通史，（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56。

¹³⁸ 鄭志明，為政在民 - 中國的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頁18。

¹³⁹ 墨子．尚同中第12，頁160。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¹⁴⁰

墨子生約春秋末年戰國初期，其時天下只剩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大國和越、魯、宋、鄭、陳、中山數小國，按理世局應可稍緩，實則不然。蓋封建體制已遭徹底破壞，各國兼併日蹙，且戰略思維更改、作戰兵器丕變、戰爭規模較之春秋時期為大，彼此廝殺爭戰，血流成河，到處盡是「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¹⁴¹的悲慘局面。像這樣戰亂頻仍，農業生產恆遭嚴重波及，經濟無從穩定，人民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民心逐漸浮動，社會跟著動盪，國是無由而定，天下紛亂至極。此時期民間望治心切，諸子百家更是率相奔走列國，是以墨子有此感言。

繼孔墨之後，另有孟、荀二人亦提出看法。先就孟子（372-289BC）來言，孟子有次在與梁襄王¹⁴²的對話中，回答梁襄王「天下惡乎定？」時，就斬釘截鐵的提出「定於一」的理念。¹⁴³由是已充分顯示他肯定統一是天下安定的唯一關鍵。在確立一統的方向後，接著就是要如何實踐，方以即之。於此，孟子則更進一步的主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¹⁴⁴換言之，行仁道，得人心，乃定天下者的關鍵。由於此時戰國七雄已互稱為王，不再尊周室為共主，並以國為中心，各自為一獨立的中央集權政府，¹⁴⁵因而孟子的一統概念大致是建立在「仁道觀」的一統上，凡踐行仁道者，才有機會定於一。這顯已迥異孔子尊周室「王天下」的思維，有著時代之進階。

而荀子（315-228BC）的主張又為何呢？荀子有云：

以國其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鄆，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

¹⁴⁰ 墨子·尚同下第13，頁193。

¹⁴¹ 戰國策·秦策四·頃襄王二十年，頁174。

¹⁴² 梁襄王為梁惠王之子，梁即魏，魏係秦之鄰國，魏惠王因畏秦之襲擊，於西元前362年自山西安邑遷都河南開封的大梁，迨後乃稱梁。

¹⁴³ 詳見孟子·梁惠王上篇，頁391。

¹⁴⁴ 同上註，頁391-392。

¹⁴⁵ 黃大受，中國通史（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再版），頁157。

謂義立而王。¹⁴⁶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矣，是所謂信立而王霸。¹⁴⁷

諸此皆強調君主縱僅擁有百里之地，且居僻遠，若能以義而立，言而有信，其威自能撼動天下，力亦足治中國，人焉不服！。由此反映出荀子乃以較直接的「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而達「天下為一」的願望。

衡觀孟荀二人，其年代相距近一甲子，但基本上對於「一天下」作為王者之最高指導戰略思維並無歧異，其不同之處只在於臻至的途徑而已，是以有所謂之王霸之爭。但荀子不認為王霸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畢竟單行王道，難以成就「一」的局面，故其宣揚「尊王而不黜霸」。¹⁴⁸荀子之見解，其實在孟子的言談中亦有相同之呼應，此可由孟子與齊宣王之對話中窺見一斑：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¹⁴⁹

顯然，孟子雖以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但基本上他並不排除武力，只在小勇與大勇之分，更也只取決於當行與不當行的仁道認定而已。

另「兼儒墨，合名法」的呂氏春秋，也一再要求思想統一，以保證社會政治活動的正常開展。¹⁵⁰其書有很鮮明的「一」概念，如「大樂篇」：

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¹⁵¹

又如「不二篇」，將「軍令齊一，戰無不勝」之事實，延伸說明眾人治國之危亂：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¹⁴⁶ 荀子·王霸篇，頁 177。

¹⁴⁷ 荀子·王霸篇，頁 178

¹⁴⁸ 張鉉根，荀子政治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1991年)，頁 91。

¹⁴⁹ 孟子·梁惠王下篇，頁 412。

¹⁵⁰ 黃朴民，董仲舒與新儒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 29。

¹⁵¹ 呂氏春秋·仲夏紀第 5·卷第 5·大樂篇，頁 256。

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者危。¹⁵²

再如「執一篇」，則強力呈現「以一治國及天下」的必要性：

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博（團結之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¹⁵³

而「有始篇」，更進而統籌規劃天地萬物，積極重現「禹貢篇」所述之四方山川一致之情境，並基此建構一大同世界：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¹⁵⁴

由上可知，呂氏春秋一書所呈現之一統觀更較前為甚，惟其著書至始皇八年（239BC）而成，其時周室已滅，而六國皆未亡，天下未一，¹⁵⁵而彼時秦幾奄有天下之半，顯然最具一統天下之勢，是故，呂氏春秋所謂之「定於一」正已有為秦國的統一探索新的理論，¹⁵⁶其立論自當也較側重於統一後王朝治平之藍圖。¹⁵⁷至此，一統概念實有世易時移、向前推進之特性。

以上所論孔、墨、孟荀、呂氏賓客大致各代表秦一統前的四段思維，其所欲建構之模式有連續與殊異性，但對「定於一」的趨向卻是大家同意的。¹⁵⁸由此歸納三大結論，一、春秋戰國之際，「一」與「同」之作為一個價值意識一直受到強調¹⁵⁹；二、一統，是諸國統治階層與社會群體上下互為因果，如水流動於中國社會的思維概念。三、一統，既允為當代社會思維，遂漸由思維轉趨行動。至若「一統」及「大一統」的源起、定義及轉化究竟為何？則勢必下探其理論根據。

¹⁵² 呂氏春秋·審分覽第5·卷第17·不二篇，頁1123-1124。

¹⁵³ 呂氏春秋·審分覽第5·卷第17·執一篇，頁1132。

¹⁵⁴ 呂氏春秋·有始覽第1·卷第13有始篇，頁657-659。

¹⁵⁵ 錢穆，秦漢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5版），頁8。

¹⁵⁶ 韓養民，秦漢文化史，（台北：里仁書局，1986年），頁6。

¹⁵⁷ 傅武光，呂氏春秋與諸子之關係，（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委員會，1993年），頁70。

¹⁵⁸ 許倬雲，「文化記憶與歷史」，聯合報，（台北：聯合報社，39版，2002年3月29日）。

¹⁵⁹ 黃俊傑，「儒家傳統與廿一世紀台灣的发展」，引自沈清松主編，詮釋與創造 - 傳統中華文化及其未來發展，（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年），頁540。。

二、大一統的意涵

從史集文獻中，相關大一統的敘述其實有限，大致可歸納為「尚書之大統」、「公羊傳之大一統」、「董仲舒之大一統」、「現代版之大一統」等四類，各呈其時代的政治面向：

（一）尚書之大統

當西周醞釀一統之概念時，尚書之周書也早見「大統」的敘述：

王若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台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¹⁶⁰

上段「大統」之統字，係代表中國自堯舜禹湯一貫的法統。由於商紂暴虐無道，違逆中國歷史文化之「仁」「義」傳承，故言周文王在位九年猶未繼此法統為「大統未集」。此處言「大統」，而非「一統」或「大一統」，其間乃存在著前節所簡述之相異的政治背景，另大統之「大」字，亦值得深入探討，如「泰誓」上篇云：

今商王受，弗敬天命，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¹⁶¹

上文之「大勳未集」與前文之「大統未集」敘述一致，這種將「大」冠於「統」之上，形成「大統」之複合句，尚不限於此。縱觀「武成篇」，其中共計「大」字出現凡九，除一般習以為常之「大王」、「大邦」、「名山大川」外，另有類似「『大』

¹⁶⁰ 尚書·周書·武成篇，頁 245。

¹⁶¹ 尚書·周書·泰誓上篇，頁 222。

統未集」之敘述，如於「泰誓篇」未引述之「庚戌，柴、望，大『告』武成」¹⁶²及「武成篇」前有引述之「將有『大』正于商」、「用附我『大』邑周」、「天下『大』定」、「大『賚』於四海」等，若去掉其中「大」字，未失原義。依此推論，「大統未集」若以「統未集」呈現，亦未嘗不可，是以，諸「大」字可以看成是彼時之通用，但此種用法，亦不該僅為時代用語而已，總該有其所欲傳達之旨趣？據此乃進一步推測，彼時之「大」字並非專為虛字，而是另涵尊重、崇敬之意，用以表述尊崇武王之偉業。而周武王能敬承天意，使中原與四方諸國紛紛降服，並進而一戰定天下，代商而立，除紂惡政，是以武王終能繼「統」，治理天下。

綜此可知，西周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之觀念，旨在強調以天命、仁德繼法統之「宗統」概念，屬君天下、國諸侯、家大夫，以及都鄙、國野的奴隸制統治的模式，¹⁶³其與「大一統」之間，僅尊「統」的依承，少「一」的時代背景。

（二）公羊傳之大一統

如前節所述，東周時期之一統已開始由概念轉趨統一的行為，既有行為，則自必有精神思維之見諸文字，以為民之師。因此初有「公羊傳」隱公上篇云：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¹⁶⁴

這春秋經上僅「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公羊傳則另以四十八字闡述之。何以王正月即大一統？其原意為何？演繹又為何？俱為重點。先就其文義歸納為四：第一，元年是人君開端的第一年；第二，王指周文王；第三，王正月指周王的正月；第四，周王的正月指統的開端。綜上得知，公羊傳之「大一統」即主張諸侯各國

¹⁶² 同上註。

¹⁶³ 張博泉，「『中華一統』論」，史學集刊，（長春：吉林大學，第2期，1990年），頁8。

¹⁶⁴ 公羊傳·隱公上，隱公元年，頁2。

宜曆法一統，並強調以周之正而統諸侯。¹⁶⁵故大一統為中國正朔觀之濫觴。

另者何言演繹？這可再由公羊傳中多處之相關文義，進一步廣義解釋「王正月，大一統。」如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記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呈現公羊傳重視周禮，鄙視夷禮、夷俗的一般性；再如它數度強化「王者無外」¹⁶⁶之觀念，故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¹⁶⁷其中顯示「王正月之大一統」豈僅止於「曆法之一統」，應另含由近之魯國，擴及中原，再至夷狄之邦的「大一統」觀，而「王者無外」，卻另有內外之別，乃為「統一」之步驟，由此臻於一統之表現，達其王正月之大一統。故公羊傳之大一統，除要「一統乎天下」，在文化、禮制上更要一統。¹⁶⁸

至若大一統之大字，是否與上述大統之大字有相同定義？則可另舉公羊傳所述之「大其為中國追也」、「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¹⁶⁹等為例，諸此大字皆有「重視」，「強調」、「讚揚」之意。蔣慶也以為大字，非形容詞辭大小之大，而是動辭的「尊大」與「推崇」之意，故大一統即「推崇」一統。¹⁷⁰綜上二述得知，古文大字的用法皆一致。但公羊傳之「大一統」，以「一」強化「統」，必有別於尚書之單字「統」，有其所欲傳達之時代意義，何言如此？蓋春秋周衰，諸國紛立，天下秩序紊亂，須能定於一尊之王者，強調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之分權一統，¹⁷¹天下始能定於一。既要定於一尊之王，則其義，當如東漢何休對大一統的解釋：

統者，始也，總系之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¹⁷²

¹⁶⁵ 李新霖，春秋公羊傳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頁56。

¹⁶⁶ 公羊傳·隱公上隱公元年，頁4；桓攻下·桓公八年，頁70；僖公下·僖公二十四年，頁266；成公下·成公十二年，頁455。

¹⁶⁷ 公羊傳·成公下·成公十五年，頁463。

¹⁶⁸ 浦衛忠，春秋三傳綜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143。

¹⁶⁹ 公羊傳·莊公十八年，頁147-148。

¹⁷⁰ 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頁352。引自吳清輝，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思想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頁84。

¹⁷¹ 李新霖，前揭書，頁54。

¹⁷² 孫開泰，「試論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中國史研究，(第2期，1993年)，頁36。

亦即所謂「大一統」乃涵蓋人與自然界萬物，由是而審視公羊傳之大一統，其初義並非強調一統之幅員廣大，而是推崇一統之精神表現，但「大一統」既強調「一」，相對的也必然產生諸多「不一」的區分。然其隨時代推進，在政治運作與社會期許中，漸而相互包容、彼此融合，而趨為「一」，即又轉為「不同同之謂之大」¹⁷³。如此乃能從推崇一統，轉成「王者無外」的理想一統，也因如此一統才能存在，也才具意義。

再者，是「一統」為一整體概念，抑或「大一統」？亦應有所說明。蓋公羊傳中既有「王者無外」的無限概念，則其「大一統」之「大」字若再作大小解釋，殆屬贅述，且與「王正月」之敘述不成對比，故藉之用以「強調」王正月之一統，反較適當。惟於實踐「一統」中，文義曾提及由中原逐次向外擴大的作為，故若以「大一統」為一概念，更切合於中國歷史之進程。因之，由「大統」、「一統」而「大一統」，遂成為中國之完整概念與象徵系統。

（三）董仲舒之大一統

秦漢政權續替，既不同於三代，尤別於春秋，為延續「統」之正當性，乃有董仲舒（183?-115BC）深具遠見地提出「大一統」之新解：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¹⁷⁴

從上段引文看出，董仲舒意識到時代的變革，企圖重新詮釋「大一統」，藉以合理化「大一統」的時代意義。其「王正月」之王不再為周文王，而轉移至「王者必受命而後王。」顯見，他理解時代的問題，乃從中國的文化社會中，尋求解

¹⁷³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30。

¹⁷⁴ 春秋繁露卷第7·三代改制質文第23，頁174。

決之道，故基本上並不反對，或可以說贊成禪讓和征誅的兩種政權轉移方式，¹⁷⁵惟其王者，必受命於天，如康有為所言「道大一統，無不統於天。」亦即無論哪一方面的大統，都是統一于天。¹⁷⁶且每於繼替時，必要有所作為，即改變曆法、更換衣服的顏色、製作禮樂。乍聽這「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似乎不具意義，實則有其象徵，即「明易姓示不相襲也；名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¹⁷⁷

當然，一個時代的思維變革，非僅憑這麼一個形式的改變，就得以正社會視聽，最重要的還需有其他政策性的配套。故董仲舒進而提出統一思想之策：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¹⁷⁸

由於仲舒時代，政治已被視為文化中最凸出的實體，思想的其他部分皆環繞著政治問題而生，¹⁷⁹故文化統一的努力自當有助於政治的統一意識。¹⁸⁰基此，其乃一再強調中國之三統（即夏、商、周之正統）與五端（即元、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五始），即意在將政權之一統與中國的文化傳承相結合：

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¹⁸¹

正此之故，漢武帝乃在政治利益的多方考量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一統思維也由此而成為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¹⁸²

¹⁷⁵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6），頁 297。

¹⁷⁶ 周桂鈿，董仲舒評傳 - 獨尊儒術、奠定漢魂，（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35。

¹⁷⁷ 白虎通義·卷 8·三正篇。引自龔鵬程，思想與文化，（台北：業強，1995 年）頁 81。

¹⁷⁸ 楊家駱主編，漢書，卷 56·董仲舒傳第 26，（台北：鼎文書局，1986 年），頁 2523。另見資治通鑑卷 17·漢紀 9，頁 555。

¹⁷⁹ 韋政通，董仲舒，（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51。

¹⁸⁰ 余英時，土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35-136。

¹⁸¹ 春秋繁露卷第 7·三代改制質文第 23，頁 176。

¹⁸² 周桂鈿，「董仲舒哲學與西漢政治」，（福建：福建論壇雜誌社，第 3 期，1994 年），頁 8。

(四) 現代版之大一統

春秋經，公羊傳，及董仲舒之大一統，代表各該時代的「政治概念」¹⁸³，也明確顯示其涵意因政局之不同，而有所變化。

歸納而言，其意可略分為「仁義之統」、「曆法的一統」、「天人自然的一統」、「奉周王朝的一統」、「諸夏的一統」、「法治的一統」、「文化思想的一統」到「宇宙間最一般規律的大一統」等。這諸多定義之終極目的，其實莫如楊向奎所概括解釋的，即從最廣義的「天人之一統」，其次之「夷夏之一統」，再到「諸侯奉正朔，形式上之一統」。¹⁸⁴衡觀此論並對照中國史走向，則大一統思想不但使中國古代的政治以一種穩定的特殊型態存續下來，並一直延續迄今，更成為解決當代中國政治秩序合法化問題的形上本源。¹⁸⁵如是，則中國與大一統思維因持續交織，而形成無法取代的「單元大一統文化」¹⁸⁶，將繼續影響中國。

一如 Karl Jaspers (1883-1969) 所言：「...歷史的圖景變成為我們決斷的一個因素」，¹⁸⁷這個決斷即是推論。在漸次揭開的圖景中，中國變得更加為清楚，它初非國名，而是文化的象徵，其後隨著朝代的鼎革，大一統正朔觀的擴大解釋，中國漸漸從對異族的區隔，轉為整個一統國家的總稱，一直到清康熙時代再轉為對外的國體稱呼。因此，從文化意義來說，中國沒有不確定性，也不曾中斷過；從歷史的整體觀來看，它是一統的，在政治地域上的分裂也只是暫時的。¹⁸⁸這「文化中國」、「政治中國」的一再互為表裡，更確定中國的發展過程，有大一統思維的形影相伴，所以稱作中國大一統。至若它的歷史進程，則需再從相關的形成、確立、持續、擴大等動態「史」中建構，才得以重現一幅更清晰的圖景。為此，本文將另闢三章分述。

¹⁸³ 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吉林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頁195。

¹⁸⁴ 孫開泰，「試論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中國史研究，(第2期，1993年)，頁36。

¹⁸⁵ 蔣慶，「儒家大一統的政治智慧與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中國文化，頁163 & 165。

¹⁸⁶ 文席謀、梁配璐，系統分析中國文化與國情，(美國：長青文化出版，1996年)，頁41。

¹⁸⁷ Karl Jaspers 著、張文傑等編譯，「論歷史的意義」，現代西方哲學譯文集，(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43。

¹⁸⁸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7年)，頁210。